



# 中国都市穆斯林社区研究述评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0)03-0156-06

● 马伟华 胡鸿保

[摘要] 本文对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都市穆斯林社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反思。在评述各类研究成果的同时,还通过列举一些研究个案来展现中国都市穆斯林社会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 都市 穆斯林问题 哲玛提(Jamaat)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以回族为代表的穆斯林民族遍布全国各地,除了西北地区的银川、兰州、西安、西宁、乌鲁木齐等城市外,北京市宣武区的牛街、天津市红桥区的西北角、北辰区的天穆镇、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郑州市的管城回族区、沈阳市的沈河区等都是比较出名的回族聚居区。维吾尔族除了世居新疆各地外,近年来在北京市的甘家口、广州市三元里的“新疆街”等地,也形成了一些较为独特的聚居地。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多,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逐渐出现在中国东部地区的沿海城市中,并且和回族、维吾尔族等穆斯林民族一起构成了一些流动社区。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对于中国都市穆斯林社区的研究越来越多,已经出版或发表多部(篇)相关内容的研究成果,成为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到目前为止,鲜有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梳理的文章。笔者在广泛查阅各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国内有关中国都市穆斯林社区的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07&ZD038)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项目编号:06JZD0024)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获得南开大学 2007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校内青年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项目编号: NKQ07047)的资助。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0 年第 3 期(总第 66 期)

2010.No.3(Total No.66)



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了反思。

### 一、哲玛提——都市穆斯林社区的核心

回族等穆斯林群众把以清真寺(Masjid)为中心的聚居区称为哲玛提(Jamaat)。该词为阿拉伯语词语,有“聚集、集体、团结、共同体”等含义。《新阿拉伯语汉语大词典》将该词解释为“一群”、“一伙”、“一批”、“一堆”、“集体”、“社团”、“协会”、“团体”、“会社”、“派别”等。有学者提出:“工具书中尚没有发现将其翻译为‘社区’的先例。然而研究和介绍伊斯兰教的英语资料中,经常把哲玛提直接对译为‘community’。”<sup>①</sup>马强曾探讨了哲玛提与社区的关系,他认为,“哲玛提和社区的区别并不在于构成要素,而是社区内的行为规范和社区意识,即社区人群的文化维系力不同,它是一种特指的社区——宗教社区。”<sup>②</sup>在他看来,哲玛提的所指可大可小,但主要是由宗教作为纽带而构成的社区,这样的宗教社区可以是实实在在的社区,也可以是虚拟的社区。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杨文炯等人对西北地区的回族哲玛提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Jamaat 地缘变迁及其文化影响——以兰州市回族穆斯林族群社区调查为个案》、《Jamaat——都市中的独特社区——以对兰州市回族穆斯林的调查为视点》、《Jamaat——都市中的亚社会与族群文化——以兰州市回族穆斯林族群调查为个案》等文章。

在《Jamaat 地缘变迁及其文化影响——以兰州市回族穆斯林族群社区调查为个案》一文以及该文的后续文章中,杨文炯重点讨论了兰州市回族哲玛提的分布特点及变迁状况。他对1949年以前以及目前兰州回族哲玛提的时空格局进行了探讨,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重点阐述了目前兰州回族哲玛提的分布状况。从宏观角度来看,他认为兰州的回族哲玛提具有这样几个特点:1.兰州回族穆斯林人口分布呈现出“分布广,相对大集中”的特点;2.兰州回族穆斯林人口分布呈自中心向市郊递减的走势;3.清真寺的分布与回族人口的区域分布呈正相关,但也存在不平衡的情况;4.兰州回族穆斯林人口的分布以关、山、岗、滩、湾以及十字路口为主。从微观角度来看,杨文炯认为,兰州市的城关区和七里河区具有较为相似的哲玛提地缘结构,作为工业区的西固区则具有比较独特的哲玛提地缘结构,红固和安宁两区作为城乡结合带则有相似的特点。此外,他还分析了一些促使回族哲玛提地缘变迁的因素:1.回族穆斯林人口增长是引发哲玛提地缘变迁的长期因素;2.工业化是引发哲玛提地缘变迁的重要因素;3.政治原因是引发哲玛提地缘变迁的极端因素;4.城市规划建设是引发哲玛提地缘变迁的最直接因素。<sup>③</sup>

在经过多年的都市回族研究后,杨文炯对其博士学位论文不断加工、修改,出版了《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一书。该书共分九章,重点对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四个西北省会(首府)城市回族的社区时间、社区空间、社区文化、社区网络结构、社区地缘结构及变迁、社区社缘变迁、教育现状、社会媒体文化、城市界面下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作者最后总结道,回族注定要面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散居的考验和经受现代化转型的阵痛,因此,以文化自觉的方式实现自身传统的现代化是城市社会中的回族穆斯林族群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sup>④</sup>

此外,马强等人还对广州市穆斯林的哲玛提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伊斯兰“乌玛”精神与都市穆斯林社区——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现状田野调查》一文中,马强试图通过对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的田野调查,来揭示这种

①② 马强.伊斯兰“乌玛”精神与都市穆斯林社区——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现状田野调查[J].世界宗教研究,2006,(1).

③ 杨文炯.Jamaat 地缘变迁及其文化影响——以兰州市回族穆斯林族群社区调查为个案[J].回族研究,2001,(2).;杨文炯.Jamaat 地缘变迁及其文化影响——以兰州市回族穆斯林族群社区调查为个案(续)[J].回族研究,2001,(3).

④ 杨文炯.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719~720.

社会组织与伊斯兰教宗教认同之间的关系,以及广州市穆斯林哲玛提的未来发展状况。

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广州市穆斯林哲玛提分为这样几个类型:1.清真寺——穆斯林暂聚的精神家园。他重点列举了怀圣寺、濠畔寺、先贤古墓、小东营寺、新市回族坟场等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的广州市穆斯林哲玛提。2.家庭型或家庭联合型——哲玛提中的基层细胞。在这一类型中,他重点列举了白云区陈田村、江夏村,白云区岗贝路、凰岗,越秀区小北路、童心路,天河区东圃镇黄村等地由来自宁夏、甘肃、青海、河南等省区的回族流动人口所组成的带有“临时性”特点的穆斯林哲玛提。3.公司型或公司联合型——通过业缘建立起来的神圣社区。在这一类型中,他列举了广州市环市中路和小北路一带的秀山楼、陶瓷大厦、天秀大厦、登峰宾馆、登月酒店,以及怡生大厦、恒景大厦、恒生大厦、国龙大厦、永怡大厦等商业写字楼这些由经常居住于此的穆斯林外商所建构的哲玛提。4.清真餐厅型——饮食习俗的整合。分布于广州市大街小巷的清真餐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穆斯林群众日常流动的哲玛提。清真餐馆除了提供日常餐饮之外,还有着约会场地、宴请场地、商贸场地等多种功能。5.学生建构的哲玛提——求知者的精神家园。在这一类型中,他详细介绍了中山大学穆斯林学生的状况。6.国内外旅行宣教团。7.网络哲玛提——虚拟与现实的结合。通过详细阐述,马强最终认为:“(广州)都市穆斯林处于传统与现代、世俗与神圣、叛离与信仰的拉力牵引下进行着选择,来自全国各地的暂住穆斯林人口在都市社区文化的复兴中起着中坚作用。因而在都市社会中,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失落,另一方面也能够时刻感受到信仰回归。”<sup>①</sup>

## 二、牛街——繁华都市回族社区的典型个案

北京市宣武区的牛街,作为华北地区都市中的一个相对较大的回族社区,由于地处北京这样一个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非常吸引学者的关注。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民族》杂志刊登了多篇介绍牛街回族社会生活的文章,如贺阳的《牛街回族的历史及其语言》,增林、东风的《牛街回民武术集粹》,黎曦的《牛街习武人》等等。这类文章一般都是介绍性的文字,学术性不强,但它们的可贵之处在于向世人介绍了牛街回族的生活状况以及一些文化事象。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学术层面对牛街回族进行研究的文章越来越多,这类文章从人口学、语言学、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个角度对牛街回族进行了研究。从人口学角度研究的,如雷永赋的《牛街回族人口比例下降探因》;从地理学角度研究的,如周尚意的《现代大都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何保持繁荣——从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空间特点引出的布局思考》;从语言学方面研究的,如贺阳的《北京牛街地区回民话中的借词》。在牛街回族问题的研究成果中,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研究的更为可观一些,这类研究成果大致有以下一些:

陈长平的《民族混居研究方法——以北京牛街回民聚居区为例所作的个案研究》。这篇文章的价值主要在于,以牛街回族作为个案,用人口普查资料并结合入户访谈等研究方法,对牛街回族与外族混居(包括共居与通婚)的各种户型进行了调查研究。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一种定量分析多民族混居现象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法。

良警宇在经过认真的田野调查后,发表了《北京牛街回民教育现状调查》以及《从封闭到开放:城市回族聚居区的变迁模式》等文章。《北京牛街回民教育现状调查》一文,介绍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牛街回族的教育发展状况,指出牛街回族与当地汉族的受教育状况已经不存在差距,儿童失学以及教育问题上的性别歧视等现象都已不存在。《从封闭到开放:城市回族聚居区的变迁模式》一文,主要对牛街回族社区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探讨。作者旨在说明:“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的变迁,经历了由相对独立的封闭性寺坊社区,转变为开放性象征社区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提出,探讨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模式等问题,不仅要关注社

<sup>①</sup> 马强.伊斯兰“乌玛”精神与都市穆斯林社区——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现状田野调查[J].世界宗教研究,2006,(1).



会距离与文化融合、民族认同等方面的关系,还要重视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作用以及城市民族分布格局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应该是都市民族聚居区的发展与民族社会历史背景、民族政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此外,这类研究文章还有彭年的《北京回族的经济生活变迁》,杨青的《从居住环境的变化看民族凝聚力》、《北京牛街回族姓氏定语的民族学解析》,郭平建、林君慧、张春佳的《北京牛街回族妇女服饰的变迁及发展趋势》。这些文章从牛街回族的生产经营活动变迁、居住格局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姓氏的民族学内涵、妇女服饰变迁等诸多方面,探讨了牛街回族的生产、生活、文化、社会发展及其变迁等重要问题。

此外,研究牛街回族问题的专著也出现了。良警宇对其博士学位论文不断修改、整理,出版了《牛街:一个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一书,该著可谓是近年来研究牛街回族问题的集大成者。这本书通过作者在北京市宣武区牛街回族社区较为扎实的田野调查,探讨了牛街回族社区在建国后几十年时间里居民的宗教、生产方式、婚姻家庭以及近年来牛街社区的拆迁工程等诸多有关牛街回族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在对这些文化事象进行详细描述的基础上,良警宇提出:“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民族政策的变化可以被看作是影响牛街这类民族社区发展方向的基础,而伴随这一过程所发生的文化互动和文化交流而导致的文化变迁,以及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文化资源的开发和资本对城市空间的重构,也对这一民族聚居区的变迁方向产生了影响。”<sup>①</sup>在良警宇这本著作出版之前,刘东声、刘盛林等人还编著了一本《北京牛街》。该著作为一本重要的地方史志资料,重点介绍了牛街的历史沿革,当地的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医药卫生状况以及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它对于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民族关系史、宗教信仰状况都有许多可供参考的地方。

此外,美国学者杜磊(Dru C. Gladney)在《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一书中,也讨论了牛街的回族问题。杜磊曾在中国进行了多年的旅行式田野调查,完成了上述著作。他在该著中,选择了四个情境完全不同的回族社区:一个是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西北苏菲派村庄<sup>②</sup>,一个是华北的城郊村庄,一个是北京的都市工人回族社区,一个是东南沿海的宗族社区。这本书的第四章共分六节探讨了牛街回族的民族认同问题:1.回族在城市:一个都市问题 2.牛街:回族的飞地 3.牛街的文本再生 4.牛街回族认同的社会经济场景 5.民族政策和都市规划 6.清真文化:都市回族认同。<sup>③</sup>

通过对四个不同类型的回族社区的调查,杜磊认为中国回族的民族认同由于受边缘、历史背景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具有相当的差异。中国西北回族聚居区的回族认同主要是宗教性的,伊斯兰教是族群认同的根本标志。散居在华北地区的回族,主要通过民族内婚体现其族群认同。北京等大都市中回族认同更侧重于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的保持。东南沿海地区的回族把早已丧失了宗教内涵的回族世系作为族群认同的出发点。

### 三、“新疆村”——都市中的维吾尔族社区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都市维吾尔族的研究,多集中在北京“新疆村”的调查研究上。“新疆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村落,也没有任何行政规划,而是由一些以新疆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众,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以及甘家口北沙沟一带聚居而形成的流动人口集中地。这些流动人口多以开清真餐馆,经营民族食品为主要经济方式。

关于“新疆村”维吾尔族群众生产、生活状况的研究,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民族问题研究的

① 良警宇.牛街:一个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23.

② 有学者对杜磊在宁夏选择的回族村庄属苏菲派村庄提出质疑,详细情况见马海云、周传斌.伊斯兰教在西北苏菲社区复兴说质疑[J].民族研究,2001(5).

③ 马海云.回族研究的新视野:一个方法论的讨论——兼评杜磊《中国穆斯林》[J].回族研究,1998,(4).

马伟华 胡鸿保·中国都市穆斯林社区研究述评

一个热点。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以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为主的一些老师,在讲授“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以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等课程的同时,带领不同班级的学生,连续五年到中央民族大学周边的“新疆村”进行调查。<sup>①</sup>这些扎实的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鲜活的调查材料,为日后开展对“新疆村”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社会文化适应等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任一飞、雅森·吾守尔等学者也对“新疆村”进行了调研,并且发表了《“新疆村”(维吾尔族村)的现状及其经营活动》、《北京“新疆村”调查》等文章。

学者们就“新疆村”问题的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对“新疆村”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餐饮业状况的研究。1996 年,杨圣敏教授带领学生对魏公村“民族食品街”上的维吾尔、傣、蒙古、回、藏、朝鲜等民族的十家餐馆经营状况进行了调查,编写了十份调查报告,并且编为题为《十个维吾尔族餐馆的调查》这样一个集子。<sup>②</sup>通过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杨圣敏等人认为,“新疆村”居民以餐饮业为主的生产经营活动,体现出一种“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这些少数民族餐厅,尤其一些维吾尔族餐厅,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都具有明显的内聚倾向。由于宗教、语言等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这些从事餐饮业的维吾尔族人很少与周边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交往,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

就“新疆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餐饮文化的研究,还有庄孔韶发表的《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等文章。庄孔韶在通过对魏公村几个少数民族餐馆进行调查后,探讨了北京魏公村“新疆街”空间社会重构的历史性关联等问题。他试图说明:“一、餐馆业的移居族群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历史意象和他们的‘意义的历史’会怎样影响他们的现代。二、从元代畏兀儿人的‘畏兀儿村’(魏公村)到今日维吾尔族‘新疆街’的迅速多元化及其空间重构过程,说明为族群象征性地专属的部分空间,他们的食品系列文本和他们的策划与演出,同是他们认同的组成部分。因此,该空间重构过程之本质是那些依附特定空间的意义载体之重构。”<sup>③</sup>

第二,通过田野调查,学者们试图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新疆村”这样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化变迁、民族关系状况等问题给予阐释。杨圣敏、王汉生等人通过对“新疆村”的研究,试图搞清楚:在现代以汉族为主的都市社会中,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向都市,并且形成了都市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那么这些聚居区形成、发展是怎样的过程以及哪些因素促使这一过程产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试图探讨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特点以及聚居区对于劳动力流动过程、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等方面的影响。此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经济和社会机构以及民族文化的保持和变迁,都是他们在“新疆村”调研后所试图阐述的问题。

第三,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以魏公村为主的北京市维吾尔族人口聚居区的形成过程、历史源流给予阐释。对于该问题的研究,除杨圣敏在上文所述的调查基础上完成的《维吾尔人与魏公村的历史渊源》一文外,还有周泓的《北京魏公村史顾》等文章。关于魏公村维吾尔人聚居区的形成历史,杨圣敏汲取了前辈贾敬颜等先生的考据成果,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1.维吾尔的族源以及族名;2.元代之前维吾尔人与北京的关系;3.元代(1279~1368)畏兀儿村的建立;4.畏兀儿村的居民;5.畏兀儿村的衰落以及魏公村得名的由来;6.魏公村的变迁;7.今日魏公村。他在经过详细论证后提出:“今北京的魏公村始建于元代,当时称为‘畏兀儿村’,是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畏兀儿村清代改称魏公村,似应与魏国公有直接关系。”杨圣敏最终认为,从元代开始一直到清代,除了聚居在京西畏兀儿的维吾尔人以外,陆续有维吾尔人迁入北京,但是畏兀儿自明代开始逐渐衰落,清中期以后,这里的畏兀儿人有的迁走了,有的逐渐融入当地汉人中。“到 1949 年时,昔日维吾尔贵族聚居的魏公村,只有 17 户汉族农户,已不见维吾尔人的踪影。”

①② 杨圣敏,王汉生.北京新疆村调查之一:北京“新疆村”调查[A].王晓莉主编.民族研究文集[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133.

③ 庄孔韶.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J].社会学研究,2000(6).



#### 四、都市穆斯林社区研究成果的学术反思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都市穆斯林社区的研究,一直在关注传统穆斯林的“哲玛提”。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研究者逐渐将学术视野拓展到城市散杂居穆斯林社区中,并由此展开了深入研究。近年来,这类主题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研究水平也在逐渐提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前有关都市穆斯林社区研究的一些成果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笔者认为,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都市穆斯林社区的相关研究中,所选择的城市还比较少,研究个案也显得比较单薄。因此,这类问题的研究,还应当寻找一些更具代表性与说服力的研究个案,在加大调查力度的基础上,将都市穆斯林社区的研究作得更为深入。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类研究成果选择的调查地点多集中在西北地区的兰州、西安、银川等城市,当然北京、广州等城市的穆斯林社区研究也比较充分,但是在东部其他沿海城市以及东北地区、西南地区的一些城市选择的调查个案还相对较少。当然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这些城市可能缺乏一些民族学的教学与科研机构,另外这些城市的穆斯林常住人口相对较少等。不管怎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流动的不断增多,我们有必要在都市穆斯林社区的研究中,增加一些更为鲜活的研究个案,在关注西北、华北等地区穆斯林人口相对较多的城市的基础上,尽量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东部沿海城市散杂居穆斯林社区中。

第二,研究方法的单一以及缺乏相关学科的整合,成为制约都市穆斯林社区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都市穆斯林社区的研究作为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必要实现多学科整合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使用。都市穆斯林问题既是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需要探讨的问题。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应当自觉地采用多学科的视角,既可以用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去分析,也可以从人口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的角度去探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一些研究成果的学术深度、理论与现实意义就会不断彰显。

由此看来,目前有关都市穆斯林社区的研究成果,的确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也是今后在此类问题的研究中需要不断改进与提高的地方。到底应该如何弥补这些不足呢?笔者认为,应当在不断拓宽学术视野的前提下,尽量实现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在娴熟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一些更为典型的研究个案。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小见大”中,通过大量鲜活的研究个案,展现目前中国都市穆斯林社区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目前都市民族问题研究的整体水平。

[收稿日期]2009-09-30

[作者简介]马伟华(1977~ )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天津 300071  
胡鸿保(1948~ )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导。北京 100872

### Comments on the Study of City Muslim Communities in China

Ma Weihua Hu Hongbao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city Muslim communities in China since the middle of 1990s. It also points out the hotspot of the study of city Muslim communities based on some examples.

**Key words:** Chinese city, Muslim community, Jamaat